

# 第四届全国“中国历史文选” 教学改革研讨会综述

由北京师范大学、厦门大学、东北师范大学三所高校共同发起，经教育部批准并专门颁发文件，委托北师大历史系主办的第四届全国“中国历史文选”教学研讨会，于2002年5月在北京召开。

## 一、新形势与新发展

这次大会召开的时间具有特殊意义：它是新世纪的第一次，也是新千年的第一次。我们的祖国在改革开放方针指引下，经济迅猛发展，其成果举世瞩目。经过十几年的努力，我国终于在去年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这更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香港、澳门顺利回归，申办奥运喜获成功，一系列重大喜讯标志着祖国正在以前所未有的矫健步伐向前迈进！

教育界也是喜讯频传：首先是教育部于去年颁发了“四号文件”，重申了高等院校中教学工作的重要性，这对扭转多年来高校只重科研、不重教学的状况，将产生深远影响。

其次是在第一期文科教学基地的建设取得成功之后，教育部又投资建设第二期教学基地，这对于资金颇为短缺的文科各系来说，无异于久旱逢甘霖，对其今后的发展必将起到重大的推动作用。

第三是教育部对一批重点院校大力扶持，即对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两所高校投资18亿元，对复旦大学、中国科技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八所院校投资12亿元，对其他20余所大学投资6

亿元。进入新世纪后，现代化教育手段是教学改革的重要内容，而添置现代化设备无疑需要大量资金。上述投资，为这些院校今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为我国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增添了新的动力。

在这种大好形势之下，我们第四届全国“中国历史文选”研讨会召开了。

自1997年5月到本届会议召开，本学科（几年前，就有学者提出要建立“历史文选学科”，因此这里也使用“学科”一词。）在这跨世纪的五年中，又取得了不少进展。

首先是教材出版——自上次会议至今的五年中，又出版了六部教材。

第一部是兰州大学历史系汪受宽、高伟主编的《中国历史文选》（上下两册），由甘肃文化出版社于1998年2月出版。

第二部是由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的张大可任主编，郑之洪、徐景重任副主编的《中国历史文选》（上下两册），另有一册由郑之洪任主编的《中国历史文选导读》，均由陕西人民出版社于1998年8月出版。

第三部是由北京师范大学刘乃和任主编、汝企和任副主编的《中国历史文选》（上中下三册），于1999年6月由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出版。

第四部是山东大学的王育济、广西师范大学的周作明主编的《中国历史文选》（上下两册），于2001年9月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

第五部是沧州师范专科学校的张金龙、保定师范专科学校的魏隽如任主编，杨燕起任主审的《中国历史要籍介绍及选读》，由高等教育出版社于1999年6月出版，2001年6月第三次印刷。

（以上五部教材的详细情况，请见本书刘淑英老师的文章《〈中国历史文选〉教材评介》在此不赘。）

第六部是杭州师范学院主编的教材。然而迄今尚未得见，故

无法讨论。

从上述五部新教材看，“中国历史文选”教材的编纂呈现出如下一些趋势：

一是教材编纂依然保持发展态势。

笔者曾经在《对建国以来“中国历史文选”教材的回顾与思考》一文中（请见本书末篇），把1997年以前的教材编纂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时期是1949年10月至1962年12月，这十三年中有七种教材问世。此期可称为奠基期。

第二时期是1963年1月至1982年8月，这二十年之间未出版一部教材。可称之为停顿期。

第三时期是1982年9月至1997年9月，这十五年内出版教材十九种。可称之为发展期。

这种分期方法如果能够得到各位同仁认可的话，那么自1997年以来的五年间，可谓仍然保持了1982年以来的发展势头。

二是书名进一步趋向统一。以往历史文选课的教材，使用书名有四五种之多，除《中国历史文选》外，最常见的就是《中国历史要籍介绍与选读》。近年来书名渐趋统一，上列的五种教材，以《中国历史文选》为名的就有四部。我们北师大的教材，过去名为《中国古代历史文选》，新教材也更名为《中国历史文选》。

名称的日趋统一，反映出文选学界对这门课的共识日渐形成的趋势。

三是注重对教学目的的探讨。五种新教材中，有三种的前言或序（或转引的教学大纲）中都对教学目的有所阐发。尽管看法不尽相同，但都显示出教材编写者对本学科理论问题的重视与思考。

四是创新意识突出。新教材理应有不同于以往之处，而创新

意识在这五种教材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如篇章选录、间架结构、辅助内容等许多方面，每种教材都有不同程度的创新。限于篇幅，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

五是辅助内容丰富。在上文所述的“奠基期”阶段，七种教材中有的没有辅助内容（有的甚至连注释都没有），而有辅助内容的教材，其形式也很单调。而在“发展期”阶段，辅助内容迅速增加，总共达七类之多。近五年来，这种态势继续发展，如北师大历史系因专门为本课开设了实习室，所以在教材中又增设了实习系列；而张大可、郑之洪主编的教材，更专门编纂了《导读》一书，书中全是辅助内容。这种趋势表明：学界对历史文选这门课复杂性的认识逐渐深化——这门课与一般古代汉语课的重要区别之一就在于：它要涉及许多历史方面特有的内容，如古代典章制度、史料分析等。因此，设立多项辅助内容，就有利于学生更容易、更系统地掌握这些知识，从而扫清阅读古籍的障碍。

五年来发展的第二方面表现是教师队伍的进一步成熟。1997年桂林会议时，出席会议的“30余人中，具有正高职称的约有11人，具有副高职称的16人，故具有高级职称的……占与会人数的三分之二强。”（杨燕起《“中国历史文选第三届全国教学研讨会”概述》，见《中国历史文选教学研究》第三辑）而本次会议，据寄来的回执统计：与会教师共43人，其中教授23人，副教授16人，讲师4人。高级职称共39人，在与会教师中超过了9/10！其中博士、博士生导师的比例也有增加。而4名讲师则是我们队伍中最年轻的生力军，他们朝气蓬勃，是本学科的未来和希望。

第三方面是讨论的议题更为广泛。前三届会议研讨的问题已相当广泛，本届仍有拓展之势。从这部论文集的题目上观察，本届会议对教材的研究，仍将是讨论的重点之一，其中包括对以往教材的评介，对以往教材注释、解题的“求疵”，以及对新教材

的设想等。对教学方法的探讨，也仍是同仁们关注的焦点之一。这方面既有全面的论述，也有从某一角度的阐发，如从教育心理学角度、从教学模式的角度、从对外教学的角度等。

除了上述议题之外，这部论文集还出现了一些颇为新颖的议题，如《外国留学生历史文选教学略论》、《简述我国古代“文选”的编纂》、《曹宪李善“〈文选〉学”》、《秦筑阿房宫以象天文说》，等等。这些表明全国同行们对历史文选的研讨范围更加广泛，也反映出本学科不断向纵深发展的趋势。

第四方面是本学科呈现出走向世界的趋势。据了解，复旦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专门为留学生开设了历史文选课，上面提到的新议题《外国留学生历史文选教学略论》，就是他们教学经验的升华。此外，北师大历史系一名长期在日本任教的学者，也将我们的《中国历史文选》教材带到了日本，准备向日本的中国史研究生讲授。（这些情况都显示出本学科将要走出国门、迈向世界。）

本学科五年来的发展远不止于这些，由于平时各院校间交流不多，因此对同行们的新探索、新成果知之甚少。这也正是我们召开会议的主要目的之一——通过会议的讨论交流，总结出各地同行在教学改革中的新措施、新成果。

## 二、大会的议程与议题

第四届全国“中国历史文选”教学改革研讨会于2002年5月18日至20日在北京师范大学召开。

大会开幕式于5月18日上午九时在北师大会议厅举行。参加本届会议开幕式的有：教育部高教司文科处的领导，北京地区高校教学指导委员会的委员，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的会长，高等教育出版社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的领导，北京师范大学的副校长和文科若干学院、系、所的领导，出版社社长，历史系、史学

所、中文系、古籍所的多位著名专家等。张岂之先生特来信表示祝贺。

开幕式由北师大历史系主任朱汉国教授主持。首先由北师大董奇副校长向大会致辞，其后教育部高等教育司文科处的副处长刘向红女士、教育部高等学校历史学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李文海教授、北师大历史系著名教授何兹全先生、刘家和先生、中国历史文献学会会长周国林教授先后讲话。他们在讲话中从不同角度论述了“中国历史文选”课的重要意义，表达了对本次会议的殷切希望。最后由北师大历史系汝企和教授作大会主题报告（详见本文集）。

18日下午与19日上午进行学术讨论。大家发言非常踊跃，畅所欲言，讨论从始至终充满了民主、和谐的气氛。

19日下午全体与会者到北京新建的中华世纪坛参观考察。

20日上午在北师大会议厅举行大会闭幕式，由王同策先生主持。会上，王同策先生、杨燕起先生、张家璠先生等老前辈先后发言。他们在发言中回顾了前三届会议的概况，对本学科今后的发展提出了殷切的期望。最后由汝企和作总结报告。

这次会议在与会者的共同努力下，开得非常成功，圆满完成了各项任务。

大会讨论情况如下。

原本计划分两个小组讨论，由于人数不多，所以讨论时自动合为一组。

18日和19日两个单元的讨论，主要集中于以下一些问题。首先是本课程的重要性问题，即这门课在各历史系、各个院校、乃至在整个社会上的地位问题。

从历史学科培养人才的角度观察，与会者一致认为：“历史文选”课是未来历史研究人才不可缺少的基础课。对于本学科的发展来讲，目前固然有不少有利因素，但不利因素也有不少，对此也需要有清醒的认识。

其一是现在的社会大环境造成对本课程的忽视。自上世纪末以来，我国的商品大潮一浪高过一浪，这对社会发展是必要的，但这一巨大浪潮也直接冲击着我国的学术界，冲击着高等院校，其影响既深刻又强烈。

在这种大背景下，学生在学习期间不能不为其将来的前程着想，一些热门学科，如外贸、法律、金融、外语等等，吸收了大量优秀生源，不少学生即使是身在历史系，心也在其他专业，努力通过各种途径向热门专业转。

其二是学术界对本学科的忽视。这突出表现在科研项目和论文刊登两个方面。

教历史文选课的教师，有不少在科研方面是历史文献学专业的，他们在申请科研项目时面对的是极为恶劣的局面——科研项目中，文科本来就比理科的经费少许多，而文科项目中，不但历史文选的研究课题在历史专业的项目中从未出现过，就连历史文献学的研究，除了全国古籍整理委员会的项目外，其他项目几乎从未设置过有关课题。因此，历史文献学的研究者要想得到科研经费，真是难上加难。

论文刊登的情况也与此相类——以北师大为例：校方将部分杂志划分为 A、B、C 三个等级，其中 A 级仅两种，即《新华文摘》和《中国社会科学》，而这两种杂志几乎从未刊登过对历史文选和历史文献学的研究文章（至多只刊登对考古文献研究的文章）。而 B 类的 22 种杂志中，与中国古代史相关的也只有《历史研究》和《考古学报》两种。我们的文章不可能刊于《考古学报》，而《历史研究》又明确表示不刊登历史文献学方面的文章。这样一来，进行历史文选和历史文献学教学与研究的教师，文章写得再精彩，至多也只能发表在 C 类刊物上！而能够刊登我们文章的不少杂志和文集，则根本未列入 A、B、C 等级之内！

上述两项，即科研经费和论文刊登的级别，不但直接关系到

教师的报酬，而且是职称评定的两项最重要的指标。其结果是：在付出同样劳动的前提下，这些教师平时的薪金就要比其他专业的教师少许多；到评职称时，他们成果的级别也无法与其他专业的相比，因此他们职称的晋升也要比其他专业的教师晚一年甚至几年——这确实是极为不公平的！

这种情况绝非只存在于北师大一家，而是普遍存在于许多院校。

历史专业在全社会中已经很不受重视，而文选学和历史文献学专业在历史专业中又受到如此不公正的对待，难怪本次会议的讨论中，“弱势群体”一词被频频用于文选学科——这既是同行们幽默的自嘲，更是客观真实的真实反映！

尽管如此，与会同仁们却没有丝毫的气馁，反而更激发出奋勇抗争的斗志——最突出的证明就是：在本次大会上，将已保持了15年的五年一次的大会间隔，改成了三年一次，即第五届会议三年之后就将召开。这是由于大家普遍认为，近年来教学改革步伐更快了，五年召开一次会议已不利于及时总结和交流经验体会，改为三年一次，将更有利于本学科今后的发展——这就是同行们面对不公平所做出的回答！

其次是教材问题。从第一届会议开始，教材一直是讨论的重点之一，本次会议也不例外。近年来不断有新教材涌现，而且每种教材都有其创新之处。这些都充分说明：在教材编纂方面，各地同仁一直在不断地上下求索着。

在本次会议的讨论中，绝大部分与会者达成的共识是：各院校的“中国历史文选”教材没有必要、也不可能统一。这首先是由于各地院校的情况很不相同，如各校的办学条件、学生的入学分数、师资力量等等，可谓是千差万别。这些差异很大的院校若使用统一教材，势必造成削足适履的结果。

原因之二是大学教学与中学教学相异，其中重要一点就是：中学教学要求统一，而大学则应该是百花齐放。教历史文选的教

师在全国至少有一两百人，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学术背景。在历史文选教学中，应该发挥每个人的学术专长，使教学具有个性化特点，这样才能达到最佳的教学效果。

第三是教学方法问题。与前三届会议相同，对教学方法的讨论仍是本次会议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的教师以自己的亲身体会，生动讲述了在历史文选教学中引入音韵学常识的上佳效果，对其他教师颇有启发。

其他许多传统的优良方法，在讨论中也得到了重申。

将多媒体技术运用于教学是未来发展的必然趋势，然而目前各历史系由于经济条件的限制，多媒体教室还很少，因此尚无法在历史文选教学中大规模地运用多媒体技术，所以在本次会议的讨论中涉及这方面的内容尚不多。

对于考试方法，有的教师提出也应如教材一样百花齐放，不必在全国统一试题——既然各院校的条件千差万别，教材也各具特色，因此考试的内容和形式也应丰富、灵活。

会议期间，还组成了联络小组，以便今后更及时地交流与本学科相关的情况或看法。联络小组初拟成员有：徐州师范大学的杨绪敏，云南大学的周琼，吉林大学的王同策，广西师范大学的张家璠，北京师范大学的汝企和，复旦大学的邹振环，厦门大学的侯真平，华中师范大学的顾志华，兰州大学的乔健等。这个名单主要考虑到地域问题，因此它包括了东、南、西、北各地的院校。今后小组成员肯定会逐渐发展。

对于本学科今后发展的展望，由于在开幕式报告中已有详细阐述，在此就不赘言了。

这次大会能够取得成功，首先要感谢教育部领导的大力支持。前三届会议一直得到教育部领导的支持，本次会议，高教司不但一如既往地专门颁发文件，委托北师大召开，教育部的领导

还亲临大会开幕式，并对本届会议予以资助。这不但在物质方面帮助我们解决了困难，更在精神上给本学科同仁们以极大的鼓舞！

其次要感谢各院校、各历史系的领导，他们对会议的一贯支持，是我们大会成功必不可少的因素。尤其要感谢北师大的校领导、教务处、出版社和历史系的领导，这次大会从始至终都得到他们的关怀和大力帮助。特别要感谢发起单位厦门大学和东北师范大学，他们为大会作出了特殊贡献。

第三要感谢各位同仁的热情支持。这次会议召开的时间，正是许多院校研究生答辩的高峰时期，不少老师日夜操劳，提前完成答辩工作，挤出时间赶来参加会议。会议期间大家畅所欲言，许多教师无私奉献出自己多年积累的宝贵的教学经验。同仁们热情的参与，是大会成功的根本保证。

最后，特别要感谢杨燕起先生、阎志坚先生。杨先生是前三届会议的发起者和组织者之一，对如何召开会议有丰富的经验。本次会议期间，他一直热心主动地为我们出谋划策，对大会的顺利进行做出了重要贡献。在教育部高教司阎志坚处长的大力支持下，本书的出版才得以最终落实。

还有许多同志为大会默默做出了各种贡献，在此谨向他们致以崇高的敬意和由衷的感谢！

“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让我们为本学科更为美好的前景而继续努力奋斗！

（汝企和根据大会资料整理）

# 让“历史文选”教学改革 与时俱进，为弘扬中华 文化做出更大贡献！

（开幕式报告）

汝企和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同学：

今天向大家汇报的题目是：《让“历史文选”教学改革与时俱进，为弘扬中华文化做出更大贡献！》。

汇报分三部分：一是历史文选学科发展的特殊重要意义；二是深化历史文选教学改革的必要性与有利条件；三是对今后深化教学改革的一些初步想法。（几年前，就有学者提出要建立“历史文选学科”，因此这个汇报里也使用“学科”这个词。）

下面先讲第一部分：本学科发展的特殊重要意义。

历史文选课是历史系的基础课。大学里基础课很多，然而这门基础课却有着极为特殊的重要意义——它与弘扬中华文化息息相关。

中华几千年的灿烂文化，在实物方面，有震惊世界、被誉为第八大奇迹的秦始皇兵马俑，有在月球上用肉眼能观察到的两种人类建筑物之一的万里长城，有改写世界音乐史的大型编钟，有不断出土的大量竹简，以及尚未发掘的秦始皇陵、唐陵、宋陵、明陵，等等；文献方面，全世界研究彗星、地震等自然现象的学者，都要到中国的典籍中寻觅世界仅存的两千多年来的原始记

录思想方面更有以《周易》、《老子》、《孙子兵法》、《黄帝内经》等为代表的极为深邃的智慧结晶，它们不但吸引了我国数千年来几乎所有最优秀的思想家、知识分子的关注与研究，而且对世界上最杰出的思想家、科学家，如黑格尔、爱因斯坦、莱布尼兹、李政道等等，都有过深刻的启迪。这些辉煌成就，是我们祖先对全人类的伟大贡献，而且至今仍在不断发挥着重大作用。

我常常对学生讲：诚然，与发达国家相比，我们国家目前在不少方面是落后了，但是总有一天，我们能够赶上甚至超过他们先进的科学技术。而上述中华文明几千年的辉煌成就，却是任何发达国家永生永世都无法企及的！为此，作为一名中国人，我感到无比的骄傲，无比的自豪！

而要研究这些中华文明的成就，除对实物的发掘、研究外，对出土与传世文献的研究就是最重要的途径。从这种意义上讲，历史文选课的传授、本学科的发展，就是直接关系到中华文明的继承与弘扬的大事，关系到新世纪里中华民族腾飞的大事！

周远清先生曾指出：“中国加入 WTO 以后……必然带来文化的多元化。学生广泛接触世界各国的文化，如何保持和发扬我国优秀民族文化传统，教育学生有一个正确的价值观、世界观，也为高等教育提出了更新的课题。”<sup>①</sup>而我们的历史文选课，恰恰与保持和发扬我国优秀民族文化传统密切相关，因此我们的教学必须不断创新，才能适应新的形势，真正肩负起发扬优秀传统文化的重任！

如果说，外语学习是通向国外文明的道路，那么，历史文选、古汉语的学习，就是打开中华几千年文明宝库的金钥匙，是通向先哲智慧的阶梯，是新世纪里弘扬中华文化的必由之路！

想到这些，我们更加感到肩上担子的分量，我们的教学改革也因此而充满了前进的动力！

我汇报的第二部分是：深化教学改革的必要性和有利条件。

首先是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形势的要求。2001年被誉为中国年，申奥成功、人世等一系列喜庆的大事，使中国以前所未有的矫健步伐迈向世界。入世后，国外的教育方式、教育理念将对国内教育界产生很大冲击——入世所带来的挑战和机遇，是国内教育界所必须应对的，也是我们每一位教育工作者必须思考的问题。我们的历史文选课，只有不断深化改革，才能面对这种挑战，抓住这一机遇。

其次是社会各方面的要求。去年教育部颁发的《关于加强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提高教学质量的若干意见》（即“四号文件”）中指出：“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和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社会各方面都对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的质量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高等学校要……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教育要求，把提高教育质量放在更突出的重要位置，实现我国高等教育的可持续发展。”

我们国家近百年、特别是近五十年来，经历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整个社会从经济基础上层建筑，都发生了巨大变革，因此社会对高等教育的需求也与以往大不相同了。我们必须面对这一现实，在课程体系和教学方法诸方面继续改进，才能跟上时代的步伐，才能真正满足社会对高等教育不断发展的要求。

第三，是加强本科教学工作的需求。

对大学教学工作来讲，上述教育部四号文件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这份文件明确指出：“高等学校的根本任务是培养人才，教学工作始终是学校的中心工作。”“本科教育是高等教育的主体和基础，抓好本科教学是提高整个高等教育质量的重点和关键。当前，必须高度重视高等教育的质量建设，把加强本科教学工作列入重要工作日程。”

文件中还特别提出：“教师以育人为天职，教学工作的好坏是衡量教师工作的主要标准，也是考核教师工作和教师职务聘任

的关键条件。在教师职务评聘中，实行教学考核一票否决制。”  
“教师要把主要精力投入到人才培养和教学工作中。”

大学本来就是教书育人的地方，其首要任务本应是教学。然而不知从何时起，科研在大学中的地位远远超过了教学——最牵动每一位教师神经的职称评聘，多年来都是偏重于科研；对某一大学或某一个系的评价，也是以科研成果为主。四号文件明确了大学的中心工作始终是教学工作，并强调教师职务聘任的关键条件是教学工作的好坏，这些对于扭转上述倾向，提高教学工作在大学中的地位，强化本科教学，无疑都将发挥极为重要的作用。

中国历史文选课的特殊重要性已如上述，因此，要提高本科教学的质量，历史文选教学改革的深化就是必不可少的重要环节。

本学科在新世纪面对种种挑战的同时，也具备了不少有利条件：

首先，教育部领导对本学科和教学工作空前重视。空前重视的标志之一：教育部对本届会议不但同往届一样，专门颁发文件，而且还特别给予资助。今天，教育部高教司的领导也来参加我们的开幕式，这些都表明教育部领导对本学科的空前支持。

标志之二：教育部对教学基地的评估和加大投资力度。以我系为例，1995年教育部在我系建立文科教学基地，并予以资助。这些资金在我系几年的发展中，起到关键性的作用。去年教育部又对文科基地进行了评估，对合格者继续投资，对优秀者则增加投资幅度。本届会议不少与会者也是文科基地的。这些举措提高了教学工作的地位，也为本学科的继续发展铺平了道路。

标志之三：教育部四号文件的颁布，已如上述。

今后发展的有利条件之二是近年来教学研究项目的逐渐增加。20世纪90年代以前，一般学科中基本上没有教学研究项目。90年代以来，开始出现这类项目，我们北师大的历史文选

教学改革就由于被批准成为当时国家教委“高等人文社会科学教育面向 21 世纪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计划”第一批立项的项目，而解决了资金困难，取得了不少进展。新世纪以来，教学研究项目更有增加之势。如从去年下半年到今年初，就连续增加了三个教学研究项目。相信在当前重视教学的大环境下，教学研究项目今后仍能保持增长势头——这对于本学科的发展和建设，无疑是极为有利的。

有利条件之三是相邻学科专家、学者的支持与帮助。以我系为例，在 1999 年召开“过关考试专家研讨会”时，就请来了史学所、中文系、古籍所的多位专家，他们对古汉语过关考试和历史文选教学的各个方面都提出了许多高屋建瓴的意见，对我们的教学改革起到很大推动作用。在此也对这些专家再次表示由衷的感谢！

各大学的中文系有着丰富的古汉语教学经验，其中许多都是我们历史文选教学可以借鉴的。例如我校中文系的专家邹晓丽先生，多年从事教学工作，她撰写的数部古汉语专著深入浅出，对我们的教学改革极具启迪意义。今天许多相邻文科系、所的领导 and 专家光临，这本身就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和鼓舞。本学科在今后的道路上，仍要不断向相邻学科的专家请教，汲取相邻学科的好经验。

下面汇报第三部分：对本学科今后发展的一些初步想法。

其一是更加注重将教育学、教育心理学原理运用于教学改革之中。教育部《全国教育科学“十五”规划要点》中明确指出：“教育学、心理学理论知识的普及工作，应当作为教育科学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指出：“在事关 21 世纪初我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具有战略性、全局性、前瞻性重大问题的研究上，要比较及时地拿出有价值、有分量的新成果；积极探索有中国特色教育的发展规律。”这些对于本学科同样是完全适合的。

我们“中国历史文选教学研讨会”从第一届召开至今，已

有 15 年了。15 年内出版的三部论文集，广泛探讨了与历史文选有关的各方面理论问题，充分显示出本学科同仁们在理论方面的孜孜求索。

从上述三部论文集中不难看出：许多优秀教师已经将教育学、教育心理学原理运用于课堂教学，如果今后能有更多教师更加自觉地这样做，并将这方面的好措施、好经验及时升华为论文，那么一定会将本学科的理论水平提升到一个新境界。

其二是加大课程深度。多年来中学文言文课水平不断提高，已发生很大变化。对于这些变化，有人进行了深入研究与精确统计，并编纂成《中学文言文索引词典》。其编纂动机，就是因发现“十年间（大学古代汉语的）教学效果之所以愈来愈不能尽如人意，关键在于我们对中学文言文教学的实际情况不明，教学的立足点与出发点偏低了”。<sup>②</sup>此言虽为中文系教师所发，但他对中学有关情况的统计与分析，对历史文选课同样具有深刻意义，因为两系学生在中学的文言文基础是完全相同的。

近年来出版的历史文选教材多数已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并采取了若干改革措施，主要有：

第一，扩展选篇的广度：早期的历史文选，选篇绝大部分是史部文献；而近些年的教材几乎都是经史子集四部兼收，这种做法显然加大了选篇的难度。

第二，增加辅助内容：辅助内容是指要籍介绍、古汉语语法、工具书简介等等选篇以外的内容。在 1982 年至 1997 年出版的 19 种教材中，辅助内容合计为 7 项；而近五年出版的 6 种教材中，辅助内容又有增加，如北师大历史系因专门为本课程设立了实习室，所以在教材中又增设了实习系列；而在张大可先生、郑之洪先生主编的教材中，更编纂了《导读》一书，集中介绍辅助内容。这些无疑也增加了课本的深度。

第三，在北师大的教材中，将编纂的新思路确定为“以‘小学’的内容（主要是实用部分）统领历史文选教学，以达到

切实提高学生素质与能力的目的”。这样确定编纂思路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要加大教材的深度。

据悉，现在又有一些院校在筹备编写新教材，相信他们也会充分注意这一问题的。

其三是进一步改革教学方法，切实提高学生的能力。以往的三部论文集中，不乏这方面的精彩篇章；相信在本次会议上，也将有不少同仁在这方面给我们带来惊喜。

我们教研室在这方面也作了两项尝试。一是建立古文实习室。1994年，国家教委在我系建立文科基地，当时在系领导大力支持下，我们为历史文选课专门设置了“古文实习室”，至今已有八年，其间几位任课教师组织了多种形式的实习，每学期至少两次。

二是古汉语过关考试。自我系成为文科基地后，就已确定要进行古汉语过关考试，不过关者不授予学士学位。而当时的学生1998年才毕业，因此过关考试的实施也是在1998年，至今已进行了五届。

设立古汉语过关考试，对提升历史文选课在各院校中的地位，特别是提高本课程在学生心目中的地位，都颇有益处。我们希望今后古汉语过关考试也能像英语四级、六级那样，分出等级，而且推广到所有相关学科。

其四是更多地运用现代化教学手段。教育部四号文件指出：“在教学活动中应用现代信息技术，是提高本科教学质量的重要手段和措施。”“国家重点建设的高等学校所开设的必修课程，使用多媒体授课的课时比例应达到30%以上，其他高等学校应达到15%以上。”我们历史文选课的教师，以往主要是钻故纸堆，四号文件的要求，对我们来讲可能比其他学科要更为困难些。然而我们也高兴地看到，几年前就已有同仁在这方面做出了努力，如制作历史文选课的多媒体课件等。今后这方面仍是我们教学改革的努力方向。